

有关苏芬战争的几个问题

徐隆彬

【内容提要】 苏联侵略芬兰的目的是想推翻芬兰执政政府而建立一个亲苏傀儡政府,它之所以在该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下就停止了战争,是为了避免几个西方大国在对这场战争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把战火烧到苏联身上;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苏军之所以损失惨重且久不能胜,是因为它因狂妄自大而在未弄清敌情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动了战争、各级指挥员能力低下、芬军防御工事坚固且战法灵活、国际上对芬兰的援助等。这场战争对苏联的积极意义是,它既使苏军受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洗礼,也使它看到了自身的缺陷,促使它吸取教训,弥补不足。消极意义是,它所暴露出的苏军低下的作战能力促使德国“提前”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从而造成了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的被动,同时它把芬兰推向了德国一边,使芬兰成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帮凶。

【关键词】 苏联 芬兰 苏芬战争

【作者简介】 徐隆彬,1960年生,《潍坊学院学报》主编、研究员。(潍坊261061)

关于苏芬战争(1939年冬~1940年春),以下几个问题无疑是很值得研究的:苏联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强大的苏联为何竟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且又久不能胜?这场战争对于苏联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主要依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苏联发动侵芬战争的目的及该目的未能实现的原因

与苏联西北边境接壤的芬兰虽是一个中立小国,但面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的形势,苏联却对它放心不下,因为作为苏联的“第二首都”、军事工业中心和十月革命摇篮的列宁格勒距芬兰边界只有32公里,不论是一旦反苏分子上台执政的芬兰,还是借用或占领芬兰南端

领土的其他国家,都可以把列宁格勒置于他们远程大炮的射程之内。为了确保西北边境、尤其是列宁格勒的安全,苏联于1938年4月和1939年3月曾先后两次向芬兰提出了缔结互助条约、租借沿海岛屿的建议,但均被对方所拒绝。1939年秋,苏联鉴于在苏德秘密议定书中已把芬兰划在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德国按照该议定书对波兰西部的占领又使自己西北边境的安全问题变得越发突出,遂不顾连遭两次拒绝的尴尬,于10月14日向芬兰提出了更大的领土要求。这一次芬兰在苏联的重压下,虽勉强同意拿出自己的几个岛屿和卡累利阿地峡的小部分领土同苏联的领土相交换^①,但终因与苏联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使双方就此问题进行的谈判于11月13日破裂。随后,苏

^①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4页。

军于11月30日越过边境,悍然发动了对芬兰的进攻。

人们通常认为,苏联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逼迫芬兰政府接受它所提出的那些苛刻的领土要求,解决在谈判桌上未能按它的意志解决的那些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推翻芬兰的现政府,为芬兰安排一个听命于苏联的不同性质类型的新政府,从而把芬兰变成它的傀儡国。还在开战的前一天,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尔金在向芬兰公使伊里耶—科斯基宁递交关于两国断交的照会时就宣称,不管芬兰的复照会作出何种答复,苏联都丝毫不感兴趣,因为苏联的照会已“结束了苏联政府与芬兰现政府之间的一切问题”^①。而在开战的当日,莫洛托夫则对德国大使舒伦堡明确谈道:“不排除在芬兰建立另一个政府——对苏联也对德国友好的政府——的可能性。这个政府将不是苏维埃式的,而是民主共和国类型的。”^②而这个时候,一个以长期在苏联从事政治活动的芬共领导人奥·维·库西宁为首的所谓“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已在莫斯科搭建起来。12月1日该“政府”在苏军刚刚占领的芬兰边境小镇特里约基宣告成立,第二天莫洛托夫便与库西宁签署了所谓《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③。此后苏联一再声称,它只承认特里约基的民主政府,而不承认赫尔辛基的芬兰政府。共产国际则指示各国共产党,“在最广泛的群众中普及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纲领性宣言、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的条约以及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④

为了停战和重开谈判,以阻止苏联更换芬兰政府计划的实现,芬兰方面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尽管当时在芬兰当政的卡廷德内阁仍深得国民的信任,芬兰议会也认为该内阁对苏联强加给芬兰的战争不负任何责任,但考虑到这届政府有可能被苏联认为是重开谈判的障碍,它还是违心地解散了该内阁而任命了一个以赖提为首的新政府,并特意让老资格的工人领袖唐纳担任外交部长。而赖提内阁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瑞典政府向苏联提出停战的可能性。12月4日瑞典公使文特专程到莫斯科,以芬兰政府的名义向莫洛托夫声明:“一直为和平解决芬兰与苏联之间冲突的愿望所鼓舞以及为了

提出新的积极建议使苏联和芬兰达成协议,芬兰政府愿意向苏联提出,后者是否准备就上述目的着手进行谈判。”莫洛托夫对此的回答是:“苏联政府不承认在赫尔辛基的所谓芬兰政府,现在它已经消失了。苏联与这个‘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召回了它派驻到那里的公使。苏联政府只承认以库西宁为首的民主芬兰政府。”^⑤这就是说,即使芬兰政府准备完全接受苏联原先提出的领土要求乃至它现在提出的更大的领土要求,苏联也绝不会停战与它和谈。由此可见,苏联通过战争推翻芬兰政府而代之以亲苏傀儡政府的决心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苏军经过了80天的殊死战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终于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了强大攻势且已攻破了“曼纳林防线”第一防御地带,芬军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占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推翻芬兰政府已是指日可待的情况下,苏联却于1940年2月20日接受了芬兰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尽管它提出的停战和缔约的领土条件要比它在战前提出的领土要求更为苛刻,但却表明这时它已承认芬兰政府而放弃了推翻它的既定计划。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在苏联对芬兰动武之时,它原以为小小的芬兰不堪一击,几天,至多十几天就会把它的政府推翻而代之以库西宁政府,很快就会干净利落地了结此事。而几个西方大国或者忙于战事,或者忙于战备,芬兰又远离他们的国土,不会对苏芬之战给予太多的关注,何况不待他们反应过来,这场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它没有料到芬兰居然如此难

①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38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进攻芬兰和成立所谓“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问题上,芬共中央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除库西宁一派表示拥护外,图奥米宁(芬共中央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一派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图奥米宁先是由于1939年11月断然拒绝了苏共让他到莫斯科参加组建“芬兰民主政府”的要求,后又于1940年4月4日发表了致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公开信。信中说:苏联的内外政策“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最初纲领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最近的事件,尤其是苏联对芬兰的进攻”,完全是“非正义的,残忍的”。同时他指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苏联的这些做法居然都表示“赞同”。(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398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41页。

打,更没有料到随着这场战争的进行,几个西方大国会作出那么强烈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应,以至到了要对这场战争及苏联本土联合实施军事干涉的地步。

还在1939年12月5日,也即苏芬战争进行了尚不到一周,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就在议会提议,鉴于苏芬战争爆发,英国应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随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建议,英法和德国签订为期30天的停战协定,以便“冷静地讨论”由于苏芬战争所引起的“局势”^①。与此同时,美国毫不客气地断绝了美苏的贸易关系,并冻结了苏联在美国的资金。12月14日国际联盟大会断然宣布:由于苏联已“以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因此决定把它从该组织中开除出去。1940年1月20日,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不仅对“孤军奋战的芬兰”做了高度评价,说“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熄灭的话……那很可能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并且还代表英法政府宣布:“西方将立即采取行动(指参加反苏战争——作者注);不再需要征求挪威和瑞典的意见,只要通知他们就行。”^②2月4日美国国会议员塞勒在议会声嘶力竭地叫嚷:“几个月以前,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我们会帮助芬兰。我们把它引向了战争。”^③意思是说,芬兰是因为相信美国会给它以大力支持,才敢于同苏联战斗下去的,既然它因相信我们而投入了战斗,我们就不应对它坐视不管。而这个时候,英法已在酝酿向芬兰派遣一个15万人的大兵团,从芬兰领土上对苏军发起进攻的问题。此外他们还计划组织一支有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参加的军队,向苏联的南部边境实施进攻,其中包括通过空中轰炸,使高加索油田停产^④。

苏联政府是通过情报部门和其他渠道获知上述消息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一旦英法在美国的支持下从北部和南部向苏联发起攻击,早已在占领的波兰领土上部署兵力的德国乘机从西部对苏联发起攻击,苏联便会陷入三面受敌的境地。显然,避免这种危险处境的降临,便是它放弃推翻芬兰政府的初衷,而于2月20日接受芬兰的和谈建议并最终于3月12日与之缔结和约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1940年3月18日由苏联操纵的共产国际在就苏芬和约的缔结给比利时、法国、英国和

瑞士共产党的指示中,才把苏联接受芬兰的和谈建议和与之缔约视作它洞穿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使他们失去了干涉苏芬战争的借口,防止了他们进攻苏联的明智之举。说:“英法帝国主义分子与社会民主党首领们一起企图破坏和约的缔结,把斯堪的纳维亚拖进战争,煽动起世界大战。和约的缔结再一次粉碎了把战争扩大到北方的企图……”^⑤苏联学者伊·费·伊瓦辛在其所著的《苏联外交简史》中也写道:苏芬和约“在防止扩大战争范围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英法原定(1940年)3月15日进攻苏联的计划也被粉碎了。”^⑥

其实,还在芬兰2月20日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之前,苏联就鉴于这场战争再进行下去所可能带来的危险而早就想把它结束了^⑦,只是由于开战之后它对芬兰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一再拒绝,并一再宣称它不承认这个政府,而它执意发动的这场战争又打得极不顺利,它感到无颜主动向芬兰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罢了。现在既然芬兰方面又主动提议和谈,它正好可以借阶而下。而且这个时候苏军已由长时间的防御转入了反攻,曼纳林防线已被基本攻破,它已占据了十分有利的谈判地位,自然也就欣然接受了芬兰政府停战和谈的建议了。

二 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苏军损失惨重又久不能胜的原因

据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所编《我们的祖国》一书说,在对芬战争中,苏联动用了96万军队、11266门大炮、2998辆坦克、3253架飞机,付出

① [苏]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62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263页。

③ 参阅[苏]《共产党人》杂志1954年第17期。

④ [苏]И. А. 基里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277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392页。

⑥ [苏]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第263页。

⑦ 当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把“法国人和英国人为支持芬兰回击我们的入侵,已准备好100个有上千人的军团。其中一个军计划用于北部侧翼,另一个应从近东进击高加索”的情报报告给斯大林时,斯大林答道,“应尽一切方法结束战争”,但“必须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参见[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了289 510人的损失^①。而据谢尔戈·贝利亚所著《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说,根据“官方资料”,在苏芬战争中,苏军官兵死53 522人,失踪16 208人,负伤163 772人,冻伤12 000多人,被俘5 000多人。前线空军损失540架飞机,仅第七集团军在突破曼纳林防线战役中便丧失1 244辆坦克。根据“西方统计资料”,芬军近2万人死亡,3 273人失踪,4万多人负伤,1 000余人被俘^②。同时这场战争也远没有像苏联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只需几天或十几天就能结束,而是整整打了104天。那么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面对芬兰这样一个弹丸小国何以显得如此无能,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呢?这曾是人们一直难以解开的一个历史谜团。而实际上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1940年3月18日的中央全会上就这场战争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在同年4月17日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都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这些报告和讲话不为外人所知罢了。现在既然这些材料已获解密,我们便据此来谈一下苏军为何损失惨重又迟迟不能取胜这个问题。

第一,骄傲自大、轻视敌人,在未弄清敌情的情况下便草率发动战争。伏罗希洛夫讲道:“在对芬战争开始之际,国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总参谋部,没有掌握多少关于敌人兵力武器、军队素质及装备质量的准确情报,特别是对卡累利阿地峡设防地区的真实情况以及芬兰人在雅尼西尔湖和拉多加湖地域构筑工事的情况了解极少。”对芬兰复杂的地形条件也未搞清。因此,“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次战争的所有特点和困难”^③。由于对敌情和这次战争的特点与困难了解不够,盲目轻敌,于是就造成了以下的情况:

其一,战争开始时兵力投入不足。战争之初苏军的进攻还算比较顺利,但在10~15天之后,也即遇到芬兰的设防区后,无论是在卡累利阿地峡还是在拉多加湖以北几个方向的苏军,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对于这场战争来说,自己一开始投入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亡羊补牢,在前线集结起足够强大的兵力,才有望扭转战局而发起新的攻势。于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只好临时决定增派国内的几十个师通过铁路奔赴作战前线的相应地段^④。这项工作本来就

“需要很长时间”,加上当时没有在铁路作战时动员,“因此军事运输是按照平时时期的列车运行时刻表进行的,这自然降低了军用列车运行和调派的速度。”^⑤结果增援部队和物资迟迟不能运抵目的地,前线迟迟不能集结起所需要的兵力和改变防守的局面,反攻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施。据伏罗希洛夫说,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苏军,1939年12月10日就已进抵芬兰设防地区的前沿阵地,但到1940年1月初才开始做突破曼纳林防线的准备工作,而直到2月11日才开始执行突破曼纳林防线的计划^⑥。

其二,由于不了解芬兰的复杂地形,误认为在芬兰战场的所有地段都可以使用重型师和坦克部队,所以在战争的前期既没有给部队配备轻型冲锋枪和50毫米迫击炮,也没有在部队开展滑雪训练。这样在那些重型武器无法发挥威力,只能运用轻型武器灵活作战的地段,苏军只能被动挨打^⑦。

其三,由于误认为战争会速战速决,在严冬来临前就能结束,所以忽略了恶劣气候对部队和战争的影响,没有给官兵准备好御寒的服装,不仅毡靴、短皮大衣难以见到,甚至就连手套也供应不足;整个1939年12月份空军因气候条件未能很好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⑧。而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苏军的战斗力。

第二,苏军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低下。关于这个问题伏罗希洛夫在总结报告中谈得很多。他说:“在战争期间组建的司令部,从最高级的到师级的在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都……不能熟练而全面地指挥交给他们的军队,没有能力对于前线不断变化的形势迅速做出反应,而是常常落在事态的后面”;“许多指挥员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不能清醒地辨明形势,而常常是不知所措,缺乏监督所属部队、建立秩序和维护严格军事

① 参见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②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80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79、72页。

④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2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83页。

⑥ 同上,第73、88、89页。

⑦ 同上,第80页。

⑧ 同上,第81、75页。

纪律的能力。”致使大批战士甚至指挥员在师团的后方闲散无事,到处游荡,道路上塞满了无人过问的辎重。伏罗希洛夫举例谈道,在拉多加湖以北作战的几个集团军,在被迫转入防御后未能组织起完善的防御,“他们把整师整师的军队部署在一条道路上,而不采取相应的战斗保障措施来掩护自己的翼侧、后方和整个交通线。”全然不顾或不知“在道路上分割和封锁我军部队”是芬兰人最惯用的战法之一。同时,这些地方的“指挥机关,包括集团军一级的指挥部,几乎没有,而在某些场合则是根本没有设法建立能保证我军部队在森林中行动并充分发挥自己强大优势——炮兵,而在有些地方也包括坦克——的阵地。”在通向后方的道路上也没有修筑配有驻守留备部队的地堡以对供给线实施保护。最后伏罗希洛夫愤怒地痛斥道:“各级指挥机关这种罪恶的消极态度,使敌人得以派出小股破坏组大量开展积极行动,而这又在指挥人员和士兵中造成了对敌人作战能力过于夸大的印象,从而使我军部队缺乏信心和感到沮丧。”“这种糟糕透顶、一窍不通而又畏缩怯懦的指挥机关造成的后果是”,有“几个师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威胁”,而其中的第44和第18师在遭到敌人的合围后又全歼。因此,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不得不撤换许多高级指挥员和参谋长,因为他们对军队的领导不仅不能带来益处,而且经认定是明显有害的。”^①

那么,苏军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为何会如此低下呢?对此斯大林讲过两个原因:

一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现代化的战争。在满洲里、哈桑湖畔或在蒙古的小战事——这不值一提,这不是战争——这是在严格限制的小块地方进行的个别战事……国内战争——这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这是没有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迫击炮的战争。”既然各级指挥员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他们自然也就缺乏组织和指挥这种战争的经验与能力,于是只好借用本来是“应该放弃的传统和国内战争的经验”,而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靠国内战争的传统方法打仗的人”,自然就成了“傻瓜”^②。

二是,“波兰的战争”对苏军指挥员们产生了

消极影响。斯大林说:“波兰的战事使我们受到极大影响,它惯坏了我们……我们的军队没有立即明白,波兰的战争——这只是军事游戏,而不是战争。”^③所谓“波兰的战争”,指的是1939年9月苏联根据与德国达成的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从波兰东部发动的进攻。当时波军最高统帅部鉴于波兰西部已遭到了德军的强大进攻,不愿再与苏军交战,遂下令波军对苏军不作抵抗,总数约30万人的波军部队随即放下了武器,苏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波兰东部。所以斯大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波兰的“军事游戏”对苏军指挥员们造成了误导,误以为自己是一支兵不血刃的虎狼之师,面对硝烟弥漫的欧洲局势,他们不仅没有为自己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感到不安和产生学习这种战争知识的紧迫感,相反认为苏军对其他国家的战事也会像对波兰的“战事”那样所向披靡。直到遇上像对芬战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刚从梦中醒来的他们面对这种原本就超出他们想象的战争,自然显得六神无主,茫然不知所措。

除去斯大林讲的这两个原因外,我们认为还有两个导致苏军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低下的原因:

一是,肃反运动对军队干部造成的损失。在1937~1940年的肃反运动中,军队一共被清除了约4万名有经验的指挥员^④。其中:5位元帅中有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部被枪杀,15名海军中中将中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9位副国防人民委员、4位空军司令和5位总参谋部侦察部队首长死于不白之冤^⑤。1940年年初,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60%的兵团部队政委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81~82、91、92页。

② [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1页。

③ 同上,第210页。

④ 刘彦章等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页。

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①。这种情况对各级指挥员造成的组织、指挥能力的下降可想而知。

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忽视了对各级指挥员的训练。苏芬战争结束后,铁木辛哥在接任因这场战争被解除的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时发现,他的前任“对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战役训练的领导仅仅反映在训练计划中和发布训令上。从1938年以来,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对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没实施过作业训练。在各军区,几乎没有对战役训练的监督。”^②

第三,芬军防御工事坚固,战法机动灵活。如果说苏联因没把小小的芬兰放在眼里,因而在没有掌握多少敌情的情况下就仓促而草率地发动了对芬战争的话,那么弱小的芬兰对于可能遭到的强敌入侵则早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所有易受攻击的危险地段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尤其是位于卡累利阿地峡、堪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媲美的曼纳林防线,可谓固若金汤。该防线东抵拉多加湖,西达芬兰湾,由英法德专家按世界最新工程技术成果帮助设计,由四条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基本防御地带和大量斜切阵地组成,整个筑垒地段布满了壕沟、鹿砦、铁丝网和地雷,并且全部处于炮火和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下。任何一支部队要想突破这道防线都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苏军虽在重型武器和大兵团作战方面优于芬军,但在拉多加湖以北布满湖泊和沼泽的卡累利阿地区,重型武器和大兵团都难以发挥出威力,芬军则利用他们所熟悉的当地复杂地理条件和苏军兵团庞大、装备笨重、运转不灵、地形不熟等弱点,将自己机动灵活的法战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用小股作战、各个击破的方法来一口口地蚕食苏军部队,配备有10挺弹夹可装70发子弹冲锋枪的小群滑雪兵,常于夜间,有时也在白天,突入苏军后方,对通常部署在道路或道路附近的苏军实施袭击,不时给敌人造成重创;在卡累利阿边境各地段苏军的后方,他们利用预先建立在这里的根据地,来破坏苏军的交通运输线,并破坏苏军各独立部队之间的联络。芬军的后勤供应也与苏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发放的白色外套使官兵与冰雪背景融为一体,起到了很好的伪装作用;配备的可供

20人使用、能折叠成手提包的帐篷和能在帐篷内取暖的便携式火炉,解决了高寒地带的宿营问题。而这些无疑都有助于提高芬军的战斗力。

第四,芬兰除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声援外,还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在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为芬兰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让其用于购买武器;英国给芬兰提供了144架飞机、114门大炮、数万颗炮弹和反坦克地雷;法国给芬兰提供了179架飞机、472门大炮、5000多挺轻机枪、数百万颗炮弹和手榴弹^③。11500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其他国家的志愿军开赴芬兰参加对苏作战^④。国际上的支持,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芬军的实力,也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和士气。

此外,这场战争对芬兰来说,是一场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战争,可谓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所以苏芬双方官兵的斗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伏罗希洛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对苏军某些部队官兵“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消极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的话,那么他对芬军的积极表现则大为惊叹:芬军“防御时坚定顽强,而且纪律严明”。他们在修筑工事时不仅极富创造性,“而且热爱劳动到不知疲倦的地步。凡是在战术上需要的地方,他们都在短时期内设置了反坦克障碍物、壕沟、鹿砦、散兵坑、避弹所和障碍地雷区,从而有力地妨碍了我军的行动和推进。”^⑤

上述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就使得苏军在这场战争中既付出了远比芬军大得多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又迟迟不能获得胜利。

三 这场战争对苏联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对苏联的意义似乎仅仅是,它在付出了如前所述的沉重代价后,迫使芬

①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③ [苏]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第262~263页。

④ [苏]И. А. 基里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276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75、76~77页。

兰接受了它所提出的比战前更为苛刻的领土要求,从而有利于保障它西北边境、尤其是列宁格勒的安全。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苏联的意义要深广得多,而且分为正反或者说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其意义有三点:

第一,这场战争使苏军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知道了这种战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打法,需要怎样的物质手段和如何运用这些物质手段,从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是卫国战争之前难得的一次实战练习。对于苏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提高它的作战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斯大林说:“我们的现代化红军是在芬兰战场上习惯打仗的——这是它的第一次洗礼。”^①

第二,这场战争使苏军得以暴露原先被掩盖着的诸多问题,促使它吸取教训,查找缺点,弥补过失,克服不足,并引发了它对现代化战争问题的深刻思考。伏罗希洛夫在1940年3月18日的报告中就针对这场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军队建设的建议。主要包括:(1)加紧造就一支训练有素、熟悉业务且深受众望的指挥员队伍,制定保障指挥员职务稳定性的措施;把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突出的指挥员登记在案,加强培养,大胆提升。(2)加强部队和司令部在与战争条件相同的困难地形和气象条件下的野外训练。(3)在部队的编制、后方机关的建制和战士的随身装备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部队机动作战的快速性、灵活性和战斗力。(4)仔细研究芬军在防御中布设障碍物和使用地雷的方法,尤其要对曼纳林防线展开研究。(5)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真正建立起在平时能提供可能的敌国的军队、装备和计划的准确情报,在战时能起到军队耳目作用的那样一种侦察机关。(6)加强交通线路的建设和运输部门的工作,因为“各个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都取决于能以多快的速度把军队和弹药补给运往前线。”^②斯大林则一方面根据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阐述了他对现代化战争问题的思考——他说:“现代化战争要求大量的炮。在现代战争中——炮是上帝……如果一天需要四百至五百发炮弹来摧毁敌人的后方、摧毁敌人的前沿,炮是第一位的。第二是飞机,大量的飞机,不是几百架,而是几千架……接下来是坦克。

第三位的,同样是决定性的:需要大量坦克,不是几百辆,而是几千辆。坦克,用装甲保护起来的——这是一切。如果坦克有厚壳,加上我们的炮兵,我们的步兵,它们能创造奇迹……迫击炮——这是第四,没有迫击炮就没有现代战争……如果您想使我们在战争中少流血——就别舍不得迫击炮……接下来是轻武器的自动化。”^③他还说,这场战争显示出我们对各军种合成的指挥员及司令部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各军种协同作战是现代化战争的主要特点之一。这场战争也显示了“我们的战士缺少主动精神,个性不够发展,受到的教育较差。当一个人不懂行时,他哪能表现出主动精神,因此他也是头脑不清的……我们需要新型的战士……使他们成为有主动精神的、个性发展的、头脑清晰的战士。”^④——另一方面,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由这场战争反映出来的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无能和失职,并毅然对其进行了改组。而在1940年12月上旬铁木辛格接替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的交接会上,与会的军事首长们更是从中央军事机关的组织和结构、战役准备、部队的补充和建设、动员准备、干部状况、部队的战斗训练、各兵种状况、侦察工作状况等方面全方位地揭露了苏军的落后与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办法^⑤。所有这些,对于苏军按照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建设,对于它作战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它在不久后粉碎德寇的进攻,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这场战争将一代名将朱可夫推到了苏联最高军事决策层。在这场战争前几个月,刚担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的朱可夫指挥了对日作战的哈勒哈河战役,在此役中他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消灭日军5.3万至5.5万人的辉煌胜利。尽管如此,他在这次战役结束后却仅仅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和一枚金质奖章,并未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特别重视,因为在这些领导

① [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第213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96~99页。

③ 转引自[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第211页。

④ 转引自上书,第212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第314~323页。

人看来,强大的苏军获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他们认为强大的苏军在几天或十几天内取得对芬兰战争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一样。然而苏芬战争给苏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暴露出的将帅无能,却迫使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对哈勒哈河战役和朱可夫另眼相看。正是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1940年5月,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月他受到了斯大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等领导人的接见,之后他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该军区掩护的乌克兰方向,当时被看作是德军进攻苏联的主要方向,其前任司令员是刚被提升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8个月后,朱可夫又晋升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和苏军总参谋长之职,从而正式进入了苏联最高军事决策层。作为最高军事决策层成员的朱可夫,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假如没有苏芬战争从反面对朱可夫的凸现,他就难以在苏德战争前担任那样高的职务,难以在卫国战争中发挥出那样大的作用,作出那样大的贡献。

从消极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对苏联的意义有两点:

第一,苏军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和所付出的代价,使它的作战能力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也使德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貌似强大的苏联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正是在这场战争后不久,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宣称:“苏维埃俄国就像窗子上的一块玻璃,一拳就能打得粉碎。”^①1941年4月召开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会议认为,如果德苏开战,那么在苏联“国境线上的激烈战斗不会超过四周,尔后就只会遇到一些无足轻重的抵抗了。”^②正是基于对苏军战斗力的这种认识,才使得德国敢于在未打败英国之前就进攻苏联,因为在它看来,既然苏联轻易就能拿下,自己也就不会长时间地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而由于斯大林一直坚信,德国绝不会在征服英国前不惜冒两线作战的危险对苏联开战^③,所以德国的“提前”进攻既完全打乱了苏联的战略部署和备战计划,也造成了斯大林对各方面提供的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的不相信,致使苏军不得不在战备工作尚未完成,临战准备也未作好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因此在苏德战争初期他们陷入了

极大被动,遭受了巨大损失。

第二,在这场战争之前苏芬进行的几次谈判中,芬兰方面曾一再强调了“芬兰政府所承担的两个义务:(1)保卫芬兰的领土,反对任何侵略;(2)不缔结任何破坏芬兰中立的协定。”^④所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芬兰必会恪守它中立国的立场,既不会与德国缔结反苏条约,也不会允许德国把部队开到芬兰,利用自己的领土作为它进攻苏联的基地。假如德国硬要这样做,它必会殊死抵抗。而如果是这样,那么至少在客观上芬兰也就与苏联站到了一条战线上。然而,由于这场战争,芬兰对苏联结下了冤仇,产生了借机对其报复的心理;德国则看到了芬兰与自己结盟的可能性和芬军英勇善战的可利用价值。所以这场战争后不久,德国便做起了争取芬兰,力求与它联手打击苏联的工作。终于使芬兰政府在1941年6月上旬同意了德国关于把它的两个师调至芬兰的建议。苏德战争爆发后,芬军更是与进驻它领土的德军一道从北部对苏联发起了进攻。一个原本保持中立而又能以自己的国土对苏联的国土起到一定庇护作用的芬兰,终因这次战争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基地之一,把自己的军队变成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帮凶。

(责任编辑 向祖文)

① 转引自〔苏〕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38页。

② 转引自上书,第438页。

③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对这一点就已讲得比较清楚。他说:为什么1918年被打败的德军现在却能打败法军?这是因为德国人从1870年战争和1914~1918年战争中吸取了教训:“1870年,德国同法国一国打仗,在后方有一个中立的,甚至是同情它的俄国。这样德国人打败了法国人。1914~1918年的情形就不同了。那时德国人不得不在西线和东线两线作战,这样他们就被打败了。现在,德国人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把意大利拉到了自己一边,并且让我们中立。”(〔俄〕《史料》1997年第5期;〔俄〕《近现代史》1998年第4期。)事实既然如此,德国人又怎么会不等对英战争结束就进攻苏联,使自己重蹈历史上因两线作战而失败的覆辙呢?同年5月底,斯大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一点讲得更为清楚。他说:现在德国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没有准备好同苏联打仗。如果希特勒分子决定进攻苏联,也要等到征服欧洲之后,使欧洲国家全部资源都供德国使用,根本上巩固并加强德国的军事实力。在这之前,德国是不会进攻苏联的。(参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20~37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卷,第17页。

Jiang Zhenjun Food safety is related to a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physical health,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Food safety includes three contents: the safety of food quantity, the safety of food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food safety. Despite Russia's food security risk index ranks in the "moderate", but the safety of food quantity risk index was double standard higher than its own standard, and one time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food safety limit. A key question for Russia is to improve food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Russian-made food to compensate for shortfall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to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o ensure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Liu Yubao and Zhang Guangxiang Based on newly decrypting archives, this paper try to restore the truth of the Soviet Union's first atomic bomb.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Soviet atomic bomb is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rocess. 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irstly, basic research for nuclear physics pre-WW II; Secondly, preparation for the technical conditions of the military use of nuclear energy during WW II; Thirdly, national mobilization provided organizational and material guarantee for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the first atomic bomb after WW II.

Xu Longbin The aim of Soviet invasion of Finland was to overthrow Finnish government at the moment to establish a pro-Soviet puppet government. The reason why the Soviet Union stopped the war before achieving its purpose was to avoid the armed interference and waging war to the Soviet Union by some Western powers. The war's positive implication for the Soviet Union was that the Soviet Army received the baptism of modern warfare, saw its own shortcomings and prompted it to learn to meet the shortfall of military force. The war's negative sense is that the Soviet Army's poor Soviet combat capability encouraged Germany's "early" launched an offensiv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resulted in the Soviet Union's passiv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 pushed Finland to stand with German side and became an accomplice when Germany attacked the Soviet Union.

Lei Liping Based on recently published archives, this paper studied religious economy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discussed some important topics, such a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evolution of Orthodox religious econom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development stages; struggle for power between Orthodox church and state; impact of religious economy on the state etc. The paper asserted that religious economy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oth in Russia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in the time of the Soviet Union.